



THE DR. SEAKER CHA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 ——2014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编



THE DR. SEAKER CHA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

——2014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2014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9-10635-0

I. 转… II. 复… III. 政治制度-对比研究-研究报告-世界 IV. 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3740号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2014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7 千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635-0/D · 678
定价: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从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的角度对2012年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脉络、表现形态、热点问题以及走向作了全景式的观察和分析，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危机与国际新秩序；（2）欧债与国家治理；（3）发展中国家民主化；（4）主要国家政党政治；（5）工业市场国家议会制度。

前言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春天，由香港宝声集团董事长陈耀璋先生为纪念民国时期曾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先人陈树渠博士捐资而成。复旦政治学同仁的理想是，依托和动员复旦大学的学术资源，通过这个平台来延揽全球政治学科中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杰出学者，建构国际政治研究的双边、多边互动关系，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沟通，开拓政治研究和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向。两年多来，中心面向世界各国比较政治发展领域的前沿动态，为海外优秀学者提供访问研究机会，并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组织会议讨论、发布研究报告等活动形式，初步构建了海外访问学者与复旦以及国内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的研究体系。

中心发布的这份年度比较政治发展报告，无疑是中心学人秉持学术使命、践行学术理想的一个体现，也是中心推进日常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

这份报告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承担过中心研究课题或得到中心研究资助的学者，论题来自他们熟悉和多年关注的领域。他们中有的长期致力于议会政治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资深学者，更多的是在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政党政治和民主化转型分析方面脱颖而出的年轻新锐。这些研究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点：（1）对变动世

界的敏锐省察；(2) 对事变意义的细腻感知；(3) 对冲突机理的用心辨析；(4) 对结构大势的准确把握；(5) 对发展逻辑的有力揭示。凡此种种，表达了作者在该领域的深度思考，显示了思想、理论与经验分析的有机关联。虽然这些研究远未包括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却触及到我们这个正处于多事之秋的世界的热点和关键。无论是“阿拉伯之春”导致的雪球效应，还是欧元体制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无论是大选年从发达国家到后发国家戏剧性的选票动员，还是“半威权主义政体”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洗牌；无论是多极化世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风险，还是至今仍受困于族群冲突的所谓“失败国家”的两难选择，报告的作者都努力以翔实的文献数据和科学的实证方法向人们传递着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例如，全球政治现实对比较政治学的强烈影响，包括国际秩序范围内国家间的互动因素、更为深入的民主化的压力、层出不穷的群体认同(阶级、性别、族群和宗教)对政治的冲击，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日益关注的新现象。在方法论上，面对今天的政治世界，一方面是复杂的统计学方法的大量应用强化了政治科学量化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是比较政治研究领域过去使用的解释现代化转型的若干变量，如一国政治变迁的经济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性质类型、族群宗教分裂的程度、政治精英与政党的信念与选择、大国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影响、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的类型，等等，仍然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个人的权力，打破了等级组织结构，使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信息革命产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以一种隐蔽而又明显的方式，不仅改变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的方式，而且进一步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个人与组织、反对派与执政党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令人不由想起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变化速率是0.01，现代社会则为1，后者是前者的100倍。

今天的情势和亨氏当年所处的世界相比,其变化速率的增长何止百倍,这个变革广泛而深刻的时代早已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在网络技术被大规模运用的条件下,我们不仅看到政治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政治精英快速的新陈代谢和政治注意力快速的转移,而且看到了藉由互联网对普遍参与的技术支持而产生的“一个人对一个国家”、“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甚至“一个人的战争”这样极富张力的图景。民众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个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组织的力量,在影响政治议程和结果,其已经不会满足于法条主义式的机构与制度改革的议题,个体对于自由的争取和利权的主张,也不能再简单地被视为堂·吉珂德式的耽于幻想的匹夫之勇。这似乎也是报告的作者试图传递给人们的另一种信息。

作为中心的第一份年度发展报告,作者的笔触并不严格限于过去的一年,有些研究甚至回溯到前十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第一份报告,有一个延展交代和叙事铺垫的需要。今后中心的报告将会集中关注分析发生于当年度的事件和变局,以使其与年度报告名实相符,这需要更多的作者参与其中,需要作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敏锐的观察力,裨以捕捉全球政治脉动的节律和走向,为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批判性的知识和建设性的构思。

我要感谢诸位报告撰稿者的辛劳,感谢国务学院的支持,感谢为报告最初设计殚精竭虑的陈志敏教授、苏长和教授和敬义嘉教授,感谢对报告的出版给予大力帮助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邬红伟先生。

任何批评建议都会得到诚挚的欢迎。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明明

2014年5月1日于文科楼

目录

- 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 复旦大学 李 辉 (1)
- 民主转型的前景：停滞还是进展？
——2013 年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趋势评估
…………… 复旦大学 包刚升 (19)
- 政党世界的新变化……………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周建勇 (56)
- 议会政治的危机及其出路…………… 复旦大学 臧志军 (91)
- 欧债问题的政治根源…………… 复旦大学 吴澄秋 (105)
- 多极化世界的风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 南京理工大学 尤宏兵 (121)
- 失败者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 春 (144)
- 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去特殊化的战略
伙伴…………… 复旦大学 张 骥 (179)

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

复旦大学 李 辉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最近两年(2012—2013年)国际学术界中比较政治学的新进展作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但实际上要在一篇文章中完成这一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是否要和过去作比较?如果我们要说2012—2013年某些研究是新的,很显然,要与过去的研究有所比较、有所区别才能称为“新”,那么就要对过往的比较政治学进行梳理,显然这无论是从学识还是工作量上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二是即便只谈2012—2013年国际学术界新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如果说“新”的话,大部分的文章和著作应该有一定的创新才对,那么是否要全部回顾呢?实际上,笔者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这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论,我的做法是搜集了较为知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杂志上所刊登的英文文章,对文章的篇目使用软件NoteExpress进行分类整理,并且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和过去的知识储备(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筛选标准)对2012年和2013年的两类话题进行了综述和梳理:一类是在这两年才被引起重视和集中讨论的话题,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关于“基因政治学”的争

论,《比较政治研究》上关于“政治不确定性”和政党行为的讨论等;另一类所谓的“新”进展,实际上是近5年来已经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但是依然在2012年和2013年比较政治研究的文献中有重要的延续和发现,包括制度与政策扩散、族群冲突与族群政治,以及威权政体的韧性等。

为此,本文采用的办法是从外文期刊数据库搜集了9个引用率和口碑比较好,而且以刊登比较政治学文献为主的英文刊物,查阅了其2012—2013年度发表的所有论文。这些刊物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欧洲政治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政治学》(The Journal of Politics),以及《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因为是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议题进行梳理,因此笔者剔除了这些刊物中所发表的另外两类文献:国际政治和政治思想(哲学)。一般认为,政治学由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和政治思想(哲学)三大模块构成,因此在剔除了另外两类的文献之后,剩下的都被归类到比较政治学的范畴之中,如此挑选出总共775篇文章。笔者再从这775篇文章中筛选出近两年被比较集中地讨论的新议题,在本文第二节中进行了综述和介绍。

一、比较政治学在美国的历史变迁简介

比较政治学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在正式分析中国目前的问题之前,对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是有必要的。美国绝大多数的政治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包括四类: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美国政治

(American Politics),以及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由于美国政治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因此专门开设,这并不表示美国政治不被包括在比较政治学里,这就如同中国大学的政治学系都会开设一些专门的中国政治课程,而且所有的区域研究都被划分在比较政治学之中。因此,除了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之外,比较政治学已经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政治学中的重量级理论大多从比较政治学中而来。

如果从最为宽泛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将比较和对比的方法用于对政治现象的观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很多学者在撰写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史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这么看的话,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洛克、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以及托克维尔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中。但是本文所涉及比较政治学,指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在宽泛范畴下的宏大思想史,而是特指美国政治科学兴起之后的比较政治学,这一时期出现的比较政治学号称具备了新的独特的方法(methods)、路径(approaches)与议题(issues)。

笔者通过回顾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些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总括性著作发现,美国本土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从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都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一过程作一个简要的了解。

1903年,美国政治学学会正式成立。在同一年,出版了哈蒙德(Basil Edward Hammond)的《比较政治学纲要》,很多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前后,现代比较政治学其实已经诞生了。因此,可以将比较政治学的第一个阶段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现代政治科学基本是同时诞生的。随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与现代政治科学其实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行为主义阶段,比较政治学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booming year)。但是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包括阿

尔蒙德的《共产主义的诉求》(1954)和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960)等,有着强烈的战后意识形态色彩。按照维阿达(Howard J. Wiarda)的说法,在50年代西北大学召开的一次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的会议上,众多学者表示了对这一研究取向的不满,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Harry Eckstein,麻省理工学院的Karl Deutsch,芝加哥大学的Kenneth Thompson,密西根大学的Robert Ward,以及西北大学的Roy Macridis。这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以形式-法律(formal-legal)为主要视角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强烈质疑,并且开始呼吁比较政治学应该更多地关注利益群体行为、决策以及现实政治中更多的非正式因素。也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的第一次真正革命事实上是强烈反对将意识形态强加到科学上,这点至关重要。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学进入了被学者称为“后行为主义”的阶段,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过于偷懒,并不能告诉人们关于这一阶段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详细情况。阿尔蒙德在1978年第二版的《比较政治学:系统、过程与政策》中回顾到当时政治学的发展时,提到学者们其实致力于在四个方面的努力:(1)更为综合地概括多样化的人类政治经验;(2)在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采取更注重实践的路径,更少采用正式制度的路径;(3)在理论与描述的努力方面,要求更为严谨和精确;(4)要求概括和组织出更为细致的理论框架,以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由于对于研究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学者们在占有和分析一手研究资料上下足了工夫,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纽曼(Sigmund Neumann)称为材料实证主义(material positivism)阶段。同时,这一阶段的美国政治学,由于受越南战争的影响,政府对于研究的投入开始减少,比较政治学研究也进入了一段时期的低谷。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下重新发现了国家。这种趋势在90年代中期的比

较政治学总括性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包括 Kamrava 的《理解比较政治学:一个分析框架》,其中重新审视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理论,并使用国家-社会的框架来分国别作案例分析。维阿达在《比较政治学的新取向》一书中更为详细地总结了 90 年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对“发展主义路径”(the developmentalist approach)的批判与扬弃。而新的研究取向中主要包括:依附理论,法团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理论(indigenous theories),官僚权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国家-社会关系。

在 2006 年之后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介绍性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的一些新进展,就笔者目力所及范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的发展上,比较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科一样,受全球政治现实的影响非常强烈,如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兴起阶段,就受到战后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进入 21 世纪之后,较近时期出版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开始关注的新现象是全球化的影响。Mark Kesselman 认为全球化从四个方面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1) 在国际秩序的范围产生了国家间的互动因素;(2) 国家在经济管理中的角色日渐重要;(3) 更多的民主政体以及更为深入的民主化的压力;(4) 多种多样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对政治的冲击,包括阶级、性别、族群和宗教。

二是在研究领域上,有一些新的课题涌现出来。在 2009 年出版的 SAGE《比较政治学手册》中,除了承认一些传统的研究议题,包括:政府形成、制度设计、政治文化、革命、腐败等,还归纳了一些新的正在凸显的新议题。包括:选举权威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选举腐败(electoral corruption),比较联邦主义,恐怖主义,比较区域整合与地区主义,转型正义等。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张力依然存在。案例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主力质性方法依然有着不错的市场,尤其以其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强有力的建构理论能力而没有完全失

宠。但是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迎合了政治科学量化的大趋势,以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大量涌现。但如果刨除时间变量,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单位的比较政治学,在对特殊区域加以审视的时候,只能采取小样本研究(每个区域也就几十个国家),于是新的以模糊集(Fuzzy Sets)方法进行的统计分析或者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分析也已经开始被广泛关注了,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将小样本(Small-N)研究量化努力的取向。

二、新的研究议题?

(一) 基因政治学

2013年在比较政治学界最为时髦的话题要数Evan Charney和James H. Fowler等人关于所谓的“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论战了。确实,人类在基因上的差异或者多样性对于社会乃至政治和经济行为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很容易吸引眼球的一个话题。早在2008年,James H. Fowler和Christopher T. Dawes(以下简称FD)曾经在《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过两篇关于基因和个体政治参与的文章。在《两个可以预测投票率的基因》一文中,FD发现,基因MAOA和5-HTT与个体的投票行为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拥有“高”变体(variant)基因MAOA的个体要比拥有“低”变体的有着更高的投票率,而拥有“长”变体基因5-HTT并且经常享受宗教服务的个体,则比那些不拥有这些基因特征的个体有更高的投票率。至此,FD认为人类的政治行为也是由特定的基因或者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如参加宗教活动)所决定的,并且宣称已经找到了两个决定人类投票行为的基因:MAOA和5-HTT。

与FD的观点针锋相对,Evan Charney和William English(以

下简称 CE)在 2012 年第 1 期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题为《候选人基因与政治行为》的文章,明确指出 Fowler 和 Dawes 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基因根本无法用来预测个体的投票行为。CE 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所谓“投票行为”的定义上,CE 发现,FD 所用的因变量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在上次总统大选中投过票。”如果回答“是”则为投票者,回答“否”则为非投票者。CE 认为一次选举中是否投票,根本不能代表一个个体的投票行为,影响个体在某一次选举中是否投票的因素非常多,他也许是个从来不投票的人,也许是偶尔投票的人,也有可能是经常投票但仅仅没有在上次大选中投票的个体,因此,即使两个基因与这个因变量显著相关,也不能说明通过基因就可以预测个体的投票行为,更不用说政治行为了。

其次,CE 认为 FD 所宣称的统计显著性也是有水分的。部分原因来自 The Add Health Wave III 提供的数据本身,CE 认为这一数据根本不是一个随机样本,用它来拟合的模型无法被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同时,被访者的年龄在 18—26 岁之间,这本身已经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问题的重点还不在这里。CE 发现,FD 选择的样本为在 2000 年 11 月份大于 20 岁的被访者,将这些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个群体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拥有投票权。但是 CE 发现,其实 18—20 岁的个体已经可以在 1998 年的中期选举中投票了,如果用 FD 的模型去估计样本中 18—20 岁的被访者在 1998 年的投票率时,基因 MAOA 呈现出来的统计系数是刚好相反的。而另外一个基因 5-HTT,仅仅在用于研究 20—22 岁的同期群时才具有统计显著性。

最后,更为致命地是,CE 发现 MAOA 基因其实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性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因为美国白人带有高 MAOA 基因的比率(53.4%)要远远高于亚裔美国人(31.9%),而已经有研究表明,美国白人的投票率要远远高于亚裔美国人。因此,

MAOA 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伪相关,其背后是白人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跟基因根本没有关系。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2013 年的第 2 期,专门提供了一个专栏来刊登 FD 和 CE 就所谓是否存在“基因政治学”这一问题进一步辩论的文章,可见基因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确实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但是限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赘述两派之间的争论。但值得一提的是,要想在人类的某些自然特性与后天的社会行为之间建立直接的决定性关系,恐怕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因此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基因政治学到底是一个可取的研究方向还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死胡同。

(二) 政治不确定性(political uncertainties)

除了基因政治学之外,在 2012—2013 年的比较政治学文献中,政治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也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被用以解释诸多传统研究中的重要政治现象,其中最集中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行为。为此,2013 年第 11 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杂志专门出了一期特刊集中讨论了这一话题。

Lupu 和 Riedl 是如此定义政治不确定性的:政治不确定性是指政治行动者无法对于未来的政治互动进行准确预期。笔者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不确定性:政体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和制度不确定性。他们认为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中,政治不确定性最高,这也是转型中的民主政体与老牌的稳定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区别,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在转型中的民主政体中,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和塑造了这些政体中的政治精英和政党的行为选择,使得他们与发达民主政体的政党竞争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在 Bleck 和 Walle 以及 Slater 和 Simmons 的研究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Bleck 和 Walle 发现,在非洲的选举政治中,与我们想象中的政党竞争不同的地方在于,大部分的在野党在政治竞争的过程中

都会倾向于向现任执政党提出温和的提议,而不是要彻底取代执政党。政党竞争的温和性和难以区分的意识形态,不得不说是非洲政党选举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为何这些新兴的政党会没有足够的野心提出取代执政党的议题呢? Bleck 和 Walle 利用过去 7 个选举周期中的 950 篇新闻报道,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三个层面的政治不确定性:一是对未来政治制度稳定性的不确定性,二是对选民倾向的不确定性,三是对于政治承诺的不确定性。

Slater 和 Simmons 比较了印度尼西亚和玻利维亚的政党政治,认为政治不确定性是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中导致竞争性的政党之间分享权力(甚至合谋)的共同原因。从理论上来说,民主化的目标本来是迫使政治精英通过选举来竞争权力,但是在许多国家,也经常会出现在竞争性的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精英们采取分享权力(powersharing)的策略。有时这种权力分享的范围过于广泛,以至于几乎完全瓦解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对立和竞争,所有的相关性政党组成了一个类似垄断性的“政党卡特尔”联盟。这种混杂的权力分享削弱了政党对其核心支持者的代表性和责任性,因为政党们发现即便不用兑现对核心支持群体的承诺,也可以通过权力分享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力,选民不再有办法通过投票的方式把自己不支持的政党踢出政治权力之外。印度尼西亚和玻利维亚就出现了这种状况。Slater 和 Simmons 认为这两个案例中政党间的权力分享可以追溯到民主转型过程中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政党精英利用在国家中最活跃的(分裂的)政治群体中分享行政权力的方式来应对转型和危机中的不确定性。精英之间通过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达成一种均衡,使得民主能够在不确定的危机状态中存活下来。

实际上,不确定性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政党行为,近年来还被广泛用于对其他政治现象的解释中。Stern 和 Hassid 就曾经用“不确定性”来解释当前中国的律师和记者等专业群体为何会服从国家的政治安排,而很少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来行动。在 Stern